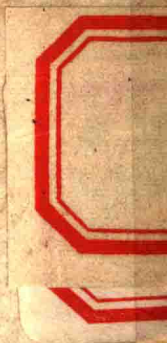


韜奮先生的流亡生活



楊明作
民主社刊



目次

一	兩次流亡一次入獄.....	一
二	不能再在那樣的空氣中呼吸下去.....	三
三	悄然出走.....	六
四	全家跟着走上流亡之途.....	一〇
五	留港努力民主運動.....	一二
六	爲生活深夜揮毫.....	一四
七	大鵬山北響起了炮聲.....	一七
八	大菜館和貧民窟裏.....	二〇
九	偷渡香港海峽.....	二三

一〇	越過了梅嶺……	二八
一一	山野草寮裏的生活……	三四
一二	他變得活潑年青了……	三七
一三	隱居在廣東鄉間……	三九
一四	從廣東到上海……	四一
一五	老太太提香籃伴送……	四四
一六	住在一個鄉紳家裏……	四七
一七	數千聽衆的演講會……	四九
一八	病阻止了他前進……	五二
一九	施行手術與鋪錠治療……	五六
二〇	與病痛苦苦掙扎……	六〇
二一	對於後事的囑咐……	六四

二二	最後一息·····	六七
----	-----------	----

附 錄

韜奮先生辭去國民參政員電·····	六九
韜奮先生留致參政會各黨派領袖書·····	七一
對國事的呼籲（韜奮先生最後遺作）·····	七四
哀韜奮先生（郭沫若先生在重慶追悼會上的演講詞）·····	八〇

一 兩次流亡一次入獄

凡是一個革命者或是愛國者，在他的一生中，入獄和流亡大概是必然經歷的階段。到後來，有的是挨過了種種的磨折，終於實現了他的理想和信仰；有的卻被苦難侵蝕了他的健康，因此而喪失了生命。

鄒韜奮先生是我國近代罕有的政論家，也是最值得欽敬的愛國運動民主運動的領導者。不幸他在去年（一九四四年）死了，他的死正是流亡生活當中種種的苦難使他磨折而死的。

韜奮先生一生，曾經經過兩次流亡和一次入獄。

第一次流亡是從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五年八月。這次流亡的原因，是由於他主編的「生活週刊」，在「九一八」瀋陽事變及「一二八」淞

滬戰爭以後，站在人民的立場，對政府有所請求與責難，而遭受到當局的誤會，處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之下；然而促成他很迅速地踏上流亡之途的，卻是因爲他參加了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與蔡元培先生等所發起的民權保障大同盟，並被推選爲執行委員之一，該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先生的被刺，使他感到自身安全的威脅，所以不得不飄遊海外，去到歐洲諸國及美國考察了一趟。

入獄就是因救國而獲罪，和六位從事救國運動的同志，被禁閉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八個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段事實。第二次流亡，是從一九四一年二月初開始，一直到他死。

韜奮先生的第一次流亡與八個月的獄中生活，他生前已在「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及「經歷」三書中詳細敘述。至於第二次流亡的情形，還很少人知道，現在間接的從他的夫人那裏聽到一些動人心魄的陳述，特

地介紹給讀者。

二 不能再在那樣的空氣中呼吸下去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正是敵人轟炸重慶的第二年，很多房子都被燒夷彈燒燬了，或是被炸彈炸塌了，震壞了。電燈祇有少數的幾條街道亮着，大多數的房子裏面都搖曳着螢火一般的油燈。房子外面更是一片漆黑，老百姓又回到中古時代的生活，打着火把或提着紙燈籠走路。那年冬天的風雨特別多，一下雨房子裏面都浙瀝地漏着水。

賴裕和他的夫人與孩子住在聚子嵐塹以北國府路以南的學田壩。他們的住宅叫「衡舍」，「衡舍」是一所有着舊式的外表而裏面卻有着新式的裝置，建築還算堅固的屋子。轟炸以後他們的屋子已經經過修理，但電

是不會有了。

韜奮白天常常要進防空洞躲警報，晚上便蜷伏在油盞下面寫文章，看稿子。夜晚昏暗的燈光底下不敢出門，因為那時重慶的報紙上也登載有「剝豬糞」和「綁架」一類的新聞。有什麼事情都是湊着白天警報的空隙時間出去。他從家裏出外，經常用兩條腿爬上三百多級的觀音岩，然後再遙遠地走到小什子銀行公會去出席憲政座談會，不坐轎，也不乘車。

物質條件的艱苦並不足以使他沮喪，而使他煩慮的，卻是另外一些暗影，在他的書桌上面堆積起很多「不合抗戰需要」的稿件，這類的稿件越積越多，而在他卻認為這些正是討論抗戰癥結問題於抗戰有益的好文章。即幸而不被判定這種空泛的罪名的稿子也很多被分肢裂體，挖目換睛，他感到異常的痛苦和工作上嚴重的困難。其次，他一手創辦辛苦經營的生活書店，在抗戰發生以後，為配合需要曾發展到五十餘個分支店，那時候已

陸續被迫停業，祇剩下渝、蓉、筑、桂、昆五個分店了。還有，居然有人在堂堂的會議中造謠說他和沈鈞儒、沙千里兩先生等準備煽動羣衆將要在雙十節那天暴動。他和沈沙兩先生一同去見負責當局，詢問此項報告材料的來源，有沒有證據，負責當局卻又絕對否認有這件事情。許多朋友善意地向他提出警誡，他除了感激而外祇是苦笑。

新年已過，時令還沒有轉變，冬之神忽然施展了他最嚴酷的威虐，吹打起一陣狂暴的風雨。韜奮先生看到有許多青年在風雨中抖索，哭泣，受到種種的迫害，又看到許多年紀大的人捶胸跌足，他看了這些情形異常的焦灼。

一九四一年二月初，這一陣暴風捲到了韜奮先生的身邊。在十天之內，生活書店的桂、筑、蓉、昆四個分店忽然間都被封閉，同事被拘捕，他氣憤到了極頂，他覺得實在不能再在那樣的空氣中呼吸下去了。

那時正是第二屆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開會的前夕，他一面向參政會報到，一面擬了電函各一：一向國民參政會主席辭去參政員職務；一向參政會同人告別。末後，他想起了多年對他提攜知遇的黃任之先生，在臨行的前一天晚上，特地跑去和黃先生告別。

黃先生勸他還是留在重慶繼續爲國事奮鬥下去。他向黃先生解釋了他的處境與困難以後，他說：「叫我還有什麼顏面坐在參政會的議席上開會？叫我怎樣能夠無視一切的事實，強行抑制住我的感情，來和諸公空談國事呢？」他的聲音由哽咽而轉到高昂。最後他們淒然地分別了。

三 悄然出走

第二天的清晨，他脫下了習慣穿着的西服，換上一件古銅色的呢袍

子。由一個共事十多年的老工友挑着簡單的行李，伴送他過江。踏上南岸，回頭向霧中的山城看了最後一眼，他默默看着這抗戰的心臟，他曾經在這中間跳動了兩年多的心臟——重慶，這時他的胸中攪和着依戀、惋惜、憤激、悲痛各種的情緒。

老工友替他安排好行李，向他鄭重道別說：「鄒先生，不知道裏在什麼時候我們纔能重行在一起？」他被這老工友的熱情所感動，他說不出話來，祇是和他緊緊地握了握手。

汽車開動了，在車前展開了崎嶇曲折的漫長的旅途，走着走着，好像永久沒有走完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旅途的終點究竟在那裏。車子爬越過工程奇偉的弔絲巖，沿途看到很多驛運的驢馬隊，以及跟在驢馬中間奔跑驅策的驢夫，他還看到許多僵僵着身軀在田間工作的農夫，他更清楚的了解，抗戰的力量是寄託在那些人的身上。

他乘坐的汽車是東南某省的公路車。他身邊帶着一份重慶某某汽車公司顧問某某某的身份證明書。有一位極熟的朋友和他作伴同行，但爲避免引起別人的注意，兩個人在汽車裏祇好裝得不相識。

他的隔座是一位某省省政府參議之類的人物，在無聊的旅途中彼此搭訕着撩起天來，先是問尊姓大名，高就那裏，韜奮就把背熟了默記在心裏的身份證明書上那一套說了，自以爲應付得非常圓滿。豈料那位參議接着就問：「貴公司共有多少輛汽車？」「目前汽油的市價如何？」這一來可把他弄窘了，總算急中生智，說他是個技術顧問，事務上的事情向來不過問，勉強的敷衍過去。

有一次，車子在一個站頭上停了下來，乘客紛紛走到太陽光下去散步。忽然有一個青年，急步搶到他的面前，喊着說：「您不是韜奮先生嗎？」他和他的朋友都吃了一驚，他連忙說：「你認錯了，我並不是的

……。」那個青年悵然失望而去。

到達衡陽，他和他的朋友分了手，獨自一個人乘湘桂鐵路的夜班車去桂林。走進車廂，坐定以後，就把白天在衡陽買的報紙打開細細的閱讀。他雖然離開了重慶，還是掛懷着重慶一切的動態。這時有一個青年打從車廂裏經過，走過他的座位的時候對他疑惑地看了一眼。隔開半分鐘，那個青年又走了回來，他連忙把報紙移上一些，將自己的臉龐遮住。那個青年來回的走到第四趟，立定了探身近前輕輕地問：「您是韜奮先生吧？您不認識我了，我是某某。」原來是和他曾經在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他喜出望外。

車到桂林，由這個青年照料他，去尋訪一位在本省有相當地位，並且也是救國會的同志的廣西朋友，這個朋友殷勤地招待他。

四 全家跟着走上流亡之途

在他出走後四五日，他家裏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一推進門就毫無禮貌地直往屋子裏衝了進去，立刻眼睛就向各處打轉，他們特別注意的是一張書桌。

「二位有什麼貴幹？」韜奮夫人很客氣地問。

「我們知道韜奮先生已離開了重慶，是到什麼地方去的？有沒有信寄回來？」這兩個不速之客說。

「他這次是激於氣憤出走的，並無一定的目的地，我也不知道他將飄流到什麼地方去，離家以後並沒有信來。」韜奮夫人婉轉地回答。

「希望鄒太太不要走，我們一定要把韜奮先生找回來。因為幾日來，

們看到邵太太到寄售商店去賣掉舊的衣物。」這兩個不速之客加重了他們的語氣說。

「呵！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打算；在韜奮出走以後，我們爲了生活不得不賣掉一部份舊東西。」她也用沉重的語氣回答。

過了兩天，前次來過的兩個不速之客中間的一個又光臨了。時間是清晨，韜奮夫人還沒有整妝，打開房門一看，就想把門關上換一件衣服。這個不速之客隨即當門一立抵住了房門，一面說：

「聽說韜奮先生已到了桂林，住在什麼地方，桂林有那些熟朋友？」
「我全然沒有接得他的消息，我沒有辦法答覆你這些問題。」韜奮夫人不耐地說。

過兩天這個不速之客又來了！……韜奮夫人感到不勝其糾纏，於是也祇好收拾了行李，攜帶着孩子，跟着走上流亡之途。

後來知道，重慶曾經有電報去桂林探詢韜奮先生的蹤跡，他恰恰於前一日飛往香港去了。

五 留港努力民主運動

韜奮到了香港以後，看到名記者兼國際新聞社的創辦人范長江，已先他而抵香港。正在與胡仲持及港紳鄧文田等籌備一種報紙，定名為「華商報」。

韜奮問起長江怎麼也來香港。

長江說在他離開桂林以前，有一天李濟琛請客——李當時是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被邀的客人除他而外，還有經濟學家千家駒。千原來在廣西大學擔任經濟學系主任，學校經過一度改組以後，已被解

聘。席間李濟琛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痛飲一番，此後恐怕很少這樣的機會了！」這明明是一種暗示，他們意會到不能再在桂林住下去了。於是長江就趕緊將桂林的國新社辦理結束——那時重慶的國新社已先奉令停止工作——，長江本人便來香港，因為國新社在香港也設有分社。

長江及其他一些朋友，問韜奮今後的計劃怎樣，是否留在香港，還是預備出國。

他向他們表示，自己並不適宜在政治方面發展，還是願意做一個新聞記者，站在人民的立場對國事提供一些意見。兩年多參加在參政會中，原想當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有效地盡一點力量。現在，事實離開這一希望已越來越遠了：抗戰軍事陷於停滯狀態，政治上發生了種種黑暗倒退的現象，國內團結問題更呈現了劍拔弩張的形勢，時機十分的危急。

他說他的出走，並不是對國事絕望，相反，正是一種積極的表示，用